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석사학위논문

韓國人是誰

(한국인은 누구인가 - 중국어번역논문)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한 중 과

엄 장 금

2020 년 2 월

韓國人是誰

(한국인은 누구인가 - 중국어번역논문)

지도교수 김 중 섭

엄 장 금

이 논문을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으로 제출함

2019년 12월

엄장금의 통역번역학 석사학위 논문을 인준함

심사위원장

趙以乾



위 원

宋 咳 宣



위 원

俞 卞 二



제주대학교 통역번역대학원

2019년 12월



目录

韩国人的深层心理

韩国社会仍然奉行权威主义吗	1
对韩国人而言，幸福是什么	8
韩国人对新事物开放吗	14

韩国青少年的生活世界

幸福是成绩名次吗	22
私人教育是什么现象	30
韩国青年失业的特殊性	38
韩国人的外貌至上主义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46

韩国人的深层心理

韩国社会仍然奉行权威主义吗

长久以来，很多东西方学者把韩国社会定义为权威主义社会。权威主义社会是指根据权威等级组织社会，从文化角度上把这种权威关系视为理所当然，或指高程度运用这种权威关系的社会。

一方面，“权威主义”是指在对方不认为是正当合理的情况下期待对方对权威的服从，或指超过正当合理的一定范围期待对权威的服从，带有一种负面意义。因此，这个概念意味着认为严格的权威等级秩序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被打破，成为了社会矛盾的源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权威都是不好的，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维持社会秩序，顺利实现共同目标，一定程度的权威关系是必要的。例如，官僚权威是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则被合法赋予的，在企业组织中，也存在以类似方式按职级而定的合法权威。问题是在职级、年龄、能力等多种权威基础中，在何种程度上奉行哪种权威才是正当合理的，当事人之间若对此未达成协议而单方面强迫对权威的服从，或基于优势权威关系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妨碍社会秩序，这种情况正是我们所批判的“权威主义社会”。

权威主义的再生机制

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和他的同事对权威主义的人性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赞扬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人人性与权威主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权威主义的人性并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经历社会化过程内在化的，尤其与在惩罚和威胁的养育方式下成长的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心怀不安，在极度依赖父母的同时又怀着对父母的惧怕和无意识的敌意。儿时的这种经历使得他们长大成人后对有权威和权威的人持有服从态度，另外，对少数群体成员或比自己弱势的人持有敌对情感。

在韩国也有人以多个群体为对象研究了韩国人的权威主义个性。研究结果表明，权威主义倾向更高的人对于所属群体的优越感更强，在判断他人或自己时，根据出生地、性别、宗教、阶层等来进行分类的倾向更高。此外，年龄越大，男学生比女学生越持有权威主义信念。另外也有人对（官僚）组织背景下的权威主义形态进行了研究，具体表现为组织内的权力追求，并不是享受工作，而是把工作当成追求权力的途径的思维，对权力者的无条件依附和忠诚的态度，这些都和权威倾向有关。另外，权威主义意识越强，对自己的地位和人气的意识就越强，对成功的欲望和对失败的恐惧也越大。这样来看，韩国人为了从事一些社会威信高的职业而倾注所有力量的态度可以说和权威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权威主义的人性通过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而被内在化的社会心理机制是什么呢？专家们在“同一化”中寻找核心心理过程。精神科专家郑慧新把“同一化”定义如下：把重要人物（或组织）的态度和行动照原样接收，“把对方理想化，无意识地把对方的信念，人格，情绪等和自己视为相同的现象。根据相关研究，在韩国，有权威主义态度的男性认为自己拥有与强者相似的特征，把自己和强者等同看待，但女性认为自己不具有和强者相似的特征，把自己与强者对立起来。另外，该研究表明：韩国人在和强者的关系中，不是通过比较贬低自己，而是抬高自己；在和弱者的关系中，不是抬高自己，而是不知不觉地贬低自己。与西方人相比，韩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更多倾向于透过关系

分析自己。因为这些原因，在韩国，越是拥有权威主义个性的人，例如，在摆宴席时的席位布置上或被邀请参加电视讨论节目时，都期待所谓的符合“级”的安排，也就是说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或至少和自己地位相仿的人搭伴，

在讨论社会文化环境反复衍生出的权威主义问题时，必须讨论的是韩国的“爱面子-给面子”惯行。当然，面子文化不仅是存在于东方，崔尚真等人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东方爱面子-给面子惯行与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韩国的特征与集体主义中的否定“自我”存在相关联。在西方文化里，面子是指持有自己的理想型自我形象，在通过和陌生人互动显现自己的自我形象时，形成和对方交感的公共自我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积极态度。在这里，管理自我形象的所谓“我”（自我）的存在是明确的，自我在所有社会关系中都以一定的自律为前提。相反，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韩国文化里，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自己和他人都是一个单位，即“我们”。此时，自我是作为群体一部分的非独立性存在。在韩国社会中，我的存在价值是根据社会的期待和压制而形成，因此，面子才是能够确认我的唯一途径，所以更加执迷于等级身份和地位，这就形成了权威主义个性盛行的文化制度背景。

权威主义的历史・制度背景

不管怎么说，韩国的权威主义个性和文化都植根于家族的权威关系经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家庭内家长主导（父权制）的权威秩序，男女不平等不仅停留于家庭的角色关系，随着近代化的到来，还扩大再生到经济政治制度上，即，在近代化以后的经济层面上呈现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家长制权威的存在把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打造成超越单纯的雇佣主和被雇佣人的关系形成家长主导的家族关

系，对于形成与西方不同的韩国式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另外，家长制的权威也反映于战后韩国政治，以“官僚权威主义”政府形式表现出来。使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关系变成家长主导的家族关系化，产生了“我要照顾的百姓”或“必须照顾我的父国”的理想。

“我会付一切责任，你们只需照做”式的国家-国民关系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基于自发性的市民社会不能植根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这种选择紧接着带来了成功的经济成长，也错过了对权威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自我反省的机会。战后，尽管韩国成功实现了其他国家都难以达成的同步实现经济增长和民主主义，但从日常生活层面来看，对于强调效率性的专业判断的依赖性依然强大，相对而言，大众参与和共同责任、以及信任精神薄弱也是事实。

一方面，在寻找韩国权威主义个性和文化的历史根源时，一定会提到儒教。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儒教中的面子时，主张由于儒教缺乏西方基督教清教徒所持有的超克和受宗教束缚的合理生活方式，因此自我控制，即修身只能集中于外在的行为举止和态度品味等面子的维持。但是，即使在相同的儒教文化圈里，韩国和中国、日本也存在差异。从最近比较东亚官僚制中的认同和面子文化的研究来看，关于认同和面子文化，中国主要在亲戚及个别关系中发生作用，日本比起血缘关系主要倾向于与生活共同体相近的小群体，韩国在集体性、等级性的“我们”群体中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另外，中国是以人情投资或互惠的形态进行利益交换和顾惜面子，日本和韩国更讲究论资排辈，看上司的眼色，对其他群体的差别对待和排斥性更强。总而言之，韩国可以概括为“集体主义的等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等级主义”的日本、“集体主义的平等主义”的中国相比，相对而言呈现出不同的权威主义面貌，这些情况在关于亲缘关系的韩·中·日的比较研究中也证实了。在中国的企业组织中，家族亲缘主义特征明显；

在日本企业组织中，职场生活中人为形成的人脉最具影响力；而在韩国，同学·同系·同届等扩大解释成的天生“我们”群体的活动十分活跃，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权威主义衰退了吗

最近，韩国社会中“我们社会中的权威在弱化”的主张和“我们社会仍然是权威主义社会”的主张同时存在。若“权威的下降”是指对应当有权威的人不赋予权威，那么“仍然是权威主义”这句话则意味着因为一些人对权威有所期待而与他人所产生的矛盾仍然存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使权威既得者的权威下降的客观行为证据广为人知。例如，认为医生是奉献牺牲的社会精英的意识逐渐消失。5分钟都不到的诊断时间，没有诚意的诊断态度，各种误诊，甚至杀害家族等犯罪行为被暴露出来，这些都成为权威下降的客观依据。

二，正当权威的基础本身在弱化。在很多权威基础中被认为是正当基础的种类根据时代而改变，例如，最近，年龄、性别等传统权威基础随着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能力和业绩中心主义等西方价值观的引进被大大削弱了。在其他能力主义社会，可以被认为是地位的正当基础，但在韩国，认为富人不是通过合法的方式积累财产，或认为学缘是通过信息垄断和人情主义贪污腐败的摇篮，由于存在这些消极意识，财产和学历自然不能被认可为正当的权威基础。

组织层面的合法地位权威好像看起来是唯一被认为是正当的，但这其中想要混淆地位权威和人格能力权威的权威拥有者和想要区分二者的权威被要求者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里，人们会期待地位身份权威和人格能力权威能够合而为一，

即，在过去，若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人们会期待他也拥有在社会关系中的杰出人格和能力。随着这种背景下的近代化发展，儒教权威关系也被适用于职业情况中，结果是在职业情况中也经常要求业务以外广范围的人格权威关系。但最近 地位·职级和人格能力这两种权威的基础被分离了，即，拥有地位·职级却没有相应的人格能力的人，他们的权威遭到拒绝和抵抗，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此外，也出现了想把其权威基础的范围严格限制于职业情况的倾向。

最后，由于对权威的期待所产生的矛盾和权威的物质主义化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复杂。据研究表明，在面子关系情况中，在显露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方式中，占最高频度的是好房子、名车、高尔夫等物质表现，而文雅的语气，从容不迫的态度，严谨的表情等内在人格表现所占的频度要低于物质表现，这种反应在年轻学生中比成人更明显。另外，根据其他研究表明，有权威主义的人不仅对“内群体-外群体”的区分意识强，对“有实际利益-无实际利益”的区分也十分敏感。越是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人对权威的服从不是因为对关于权威基础规范层面的认同，而更可能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物质主义行为。权威关系与物质主义或自我利益关系紧密结合，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对权威基础薄弱的权威要求者反而表现出较低的服从。如果说传统的权威主义是把人按身份来论资排辈，身份低的人不受尊重，那么现代的权威主义是以经济实力来等级分化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弱者就会被疏远。

权威主义的未来

今天的韩国仍然处于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对于正当的权威基础是什么、其适用范围如何等问题的期待和价值观都出现了变化，世代间、权威既得者（权威要求者）和权威被要求者间的矛盾也都浮出水面。

为了应对最近急剧变化的环境，从国家到自愿奉献的小型聚会，时时刻刻都需要准备接纳超越自己界限的革新变化。克服这种革新变化引起的不安定性的途径是积极努力地共享成员间值得达成协议的正当权威基础，在个人人性层面、社会关系层面、以及制度层面上都要倾注努力。重视惯行、重视等级、特权意识、限制参与决策等权威主义形态，其本身不仅产生个人·社会性的消极后果，还会成为阻碍积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原因。另外，权威主义具有的排它性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对陌生人的信任，阻碍了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发展，成为导致严重矛盾结构的原因。现代社会的信任结构是以亲密性为基础，越过狭小的地区，狭窄的群体界限，持续使与陌生邻居的新结合变得可能。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尊重，自愿合作的市民美德如果不去创造的话，就不能保持制度的持续性。与其把权威主义视为韩国的传统美德，不如共同努力通过在多种领域打造平等的民主关系，达成对正当权威基础的社会协议。

对韩国人而言，幸福是什么

20 世纪末，美国时事周刊《TIME》选出的“20 世纪 3 大伟人”之一——弗洛伊德，他说道“即使做了几十年的精神分析，其结果也只不过是从‘病痛的悲惨’换成‘正常的不幸。’”即，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人生从根本上就是不幸的。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对自己的人生持有乐观·悲观的见解，至少，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人生不是一直幸福的。

在韩国社会，“幸福”成为一个新的话题。对于从贫穷历史中走出来的我们民族来说，这也许是因为如今的现实使我们认为物质充足即将带来幸福，但这种期待和幻想被残忍地打破了。

人们不断地追求得不到满足的幸福，但是“怎样能体会到所谓的幸福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简单，原因在于假如幸福可以轻易得到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必要像这样为幸福而努力。

百科全书中有说明“幸福是指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或感到快乐的状态，或没有不安感，感到安心，充满希望的美好感情的心理状态和理性情境，其状态可以定为是主观性的也可以定为是客观性的。”此外，关于幸福的许多定义和说明无论古今中外都被拿出来讨论。

即使幸福的真面目不清晰，对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幸福特征，大部分学者们都是认同的。一是比起物质幸福，精神幸福更重要，即，物质满足产生的幸福感不管是深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不上精神幸福感。二是体会到幸福的感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客观

性，但最终是主观性的。在研究幸福的积极心理学中，把最重要的幸福概念称为“主观性的安宁感”即，对于自己怎样感觉的个人经历。

下面来看一下幸福的条件，关于幸福的国内外文献都说明了个人的物质需求。对于吃喝、睡觉、说话、性爱、运动、健康等需求满足都属于幸福的条件。在东方，传统上所说的五福，即，寿、贵、富、康宁、儿孙满堂也可以是幸福的条件。

另外，精神幸福条件和物质条件不同，它可以再分为两种，一是通过自我实现的幸福，通过业务成就、业余爱好、宗教生活等对自己的投资（或自我成长）得到的幸福。二是在家族、对话、爱、信念、友情、感恩、关心、分享等和他人的关系中所经历过的幸福。

有些学者主张与其从物质、精神、个人、他人的角度来谈幸福的条件，不如从最初的个人性格来谈幸福，因为这一点更重要。即，因人们性格的积极乐观与否，对于在每天生活中经历的各种事情，有的人感到不幸（或痛苦），有的人感到相反。这种性格虽然有天生原因，但可以说是由小时候各种各样的经历而形成的。越是小时候有幸福经历的人，长大后越容易拥有积极乐观的性格。从这种观点来看，可以说幸福不是已经定好的，而是来源于每天的日常生活。

精神分析作为探究人类精神的学问和治疗精神痛苦的方法，对于前面提到的人类的行动或生活本身作出了说明。即，弗洛伊德把人类的精神从结构上分为本能、自我、超自我，他说最终基于现实拥有的内在的精神安宁在精神健康方面很重要。弗洛伊德引用达尔文的话——“人类的个体发达过程本质上是沿袭人类的种族发达过程”，把小孩的成长过程分为口腔期、肛门期、生殖期，认为对满足本能需求的渴望在小孩成长时期反复出现。

但是，如人类实现人类文明，抑制本能需求一样，孩子们长大后为了适应自己所处的社会就会被要求有同样的行动。在这过程中，人在天生本能和父母培育出的道德意识（超自我）之间会产生矛盾，现实中怎样顺利解决这种矛盾完全取决于孩子的自我，即，根据天生气质和小时候的经历可以成长成健康成熟的自我，成熟的自我不仅经历个人身体·精神上的满足，和他人的关系中也过着快乐有意义的生活。也许前面说道的许多幸福条件未必是精神分析上说的通过形成成熟的自我而得到幸福的条件。

2012年，韩国同时实现了人均GDP2万美金和人口5000万名，成为了世界上第7个“20-50俱乐部”的成员，这意味着韩国不仅具备了国民人均收入竞争力，也具备了人口竞争力，这被认为是从经济上迈进先进国家队列的信号，但是韩国人的幸福水平和经济水平相差甚远。

联合国调查各国从2005年开始5年间的幸福度并发表的UN【世界幸福报告】显示，韩国在156个国家中占第56位，在2012年发表的OECD的幸福指数中，韩国在36个成员国中占第24位，另外，在盖洛普的幸福排名上，韩国在148个国家中位居第97位。由于每个调查测定幸福的方法和调查人员不同会存在一些差异，但韩国的经济地位和韩国人感到的幸福感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韩国人为什么感到不幸福呢？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科的Ed Diener教授在2010年韩国心理学会的国际学术大会上提到了韩国人不幸福的3大主要原因，其一就是韩国人的高物质主义倾向。他比较了韩国、美国、日本、丹麦、津巴布韦5个国家国民的物质主义倾向，发现韩国人的物质主义倾向比美国、日本，甚至比津巴布韦更高。

韩国人追求物质主义的倾向可以认为是前面说的对命运论幸福的意识变化。外貌、健康、长寿、儿孙满堂在过去认为是用人类力量实现不了的观念，而如今转变为由于科

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都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得到实现的观念，最终，可以看到想要通过财富和物质去追求幸福的物质万能主义急剧风靡起来。

现在，关于物质主义和幸福间的负相关关系在许多其他研究中反复出现。原因是人为了生活，物质是必需的，这虽然是事实，但如果只埋头投入到获得物质的努力中，就会忽略和家人的陪伴和兴趣活动，以及疏远对幸福产生积极影响的诸多活动。另外，极端的物质主义追求会损害只有通过公共道德，积极的人际关系，共同体意识等许多的个人努力才能成就的精神价值。

韩国人感到不幸福的另一个原因是集体主义文化。对韩国人而言，比起心理或物质支援，通过从周边人获得的人情支援的“关系支援”更能感受到幸福感，在强调共同体意识的韩国社会中，很多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以理解为群体文化对幸福感可以产生正面影响。但最近韩国社会的群体文化不是强调个人以及共同体价值的继承，群体不再强调自我实现而是变质为更侧重于集体利己主义，这种倾向在 2009 年统计厅的【韩国社会趋势】资料中也出现了。据“对他人的信任”的调查显示，19 个 OECD 成员国中，韩国居第 14 位。这意味着当面临个人危机时很难向别人请求帮助，这可以看作是前面提到的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积极层面的共同体价值遭到损害。

一方面，集体主义文化对韩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在笔者参与的研究中也有提到。在自我认同的研究中，依据杰出的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森的理论，采用 Marcia 的把“自我认同地位”进行分类的深层面谈研究方法，调查了 200 名韩国成年人，结果为“封闭型”占 78%，远远多于其他类型。

封闭型一般被大家认为是自我探索不足，带有权威主义，思想死板的集体主义倾向，即，在安定的情况下，由于在追求群体指定的价值或目标时，感觉不到什么苦闷和

矛盾，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当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处于某种危机情况时，对此的应对能力就很低下。这意味着成就自我的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探索”存在着不足，即，集体主义文化有使个人不能进行自我探索，阻碍自我成熟的发展的倾向。

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对个人认同探索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煽动了过度的竞争。虽然韩国社会的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集体主义比同属于儒教圈的中国和日本更强，但“堂兄弟买了土地，就肚子痛”的俗语只有韩国有，这表示韩国社会的家族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结构。尤其，竞争目标不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需求满足，而是为了达到韩国社会的集体标准。此外，向着不是自己的自发动机而是外部授予的目标，产生的过度竞争意识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外在发展的积极成果，但也因此造成了个人的精神疲惫。

韩国人感到不幸福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价值观混乱。在过去几十年的产业化过程中，以农业为主产业时的传统大家族体系通过产业化和城市集中化过程，经历了小家庭时代，现在进入了双职工夫妇时代，另外，离婚和再婚导致的多种家族形态开始出现。这种急剧变化造成了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变质，即，随着存在于大家族体系中的权威的渐渐消失，处于成长期的孩子们对本能需求的冲动的抑制力变弱，这可以认为对社会上的病理行为有所帮助。最近，演变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性暴力、学校暴力、无理由暴力等正是由于这些权威的崩溃造成道德涣散而导致的后果。除此之外，这种多样性的病理事件最终增大了社会成员的不安感，损害了社会安宁感，导致他们失去对他人的信任，从而使韩国人变得不幸福。

20 世纪，韩国实现了被全世界称为“汉江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进入 21 世纪，人们醒悟到物质成就不再带来幸福的事实，在过去 10 年间，追求一种“健康”，“疗愈”等精神层面的幸福。最近，在全世界“幸福指数”，“联合国人类开发指数”，“DECD 更美生活倡议”等各种观点纷纷出现，不再侧重于用 GDP 经济指标和物质价值来评价生活质量。

因此，我们社会为了变得越来越幸福，需要多样化的尝试途径。其中，改变成长中的下一代的教育环境迫在眉睫。虽然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但在 1995 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Daniel Goleman 以论文发表自己的终身研究时，很多人都受到了冲击。Daniel Goleman 教授研究的是通过从儿童时期到成人时期的前瞻性追踪调查，了解孩子们的成长状态在成人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最终，通过此研究发现情商和社会性比以前强调的智商对社会成功和幸福人生更具影响。这些事实对当时韩国教育届的启发很大，另外，由此带来了许多政策变化和教育圈的努力，尽管如此，韩国的孩子们依然处于远离人性教育的应试教育的现实中。尤其从自我认同，自我探索的观点来看，现在以升学考试为主的教育几乎被判断为不能带来机会。所以，不得不让人提出深深的疑问，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在其成长过程中或成人以后是否会想到自己有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因此，即使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对正在成长中的下一代提供更体系化的人性教育，最终，通过自我成长寻求幸福人生，此外，现在持续过着疲惫生活的成人们与其徒劳地怀着和他人竞争的浅薄之心或执迷于外在地成果，不如不断的通过自我反省养成丰富的内涵才是正确的。

韩国人对新事物开放吗

面对他者时，朝鲜人的自我

关于韩国人对新事物是否开放的问题以从外部引进的新事物或思想与其文化渗透为前提。进入 19 世纪，韩国历史上对于超越东亚范围的外来他者的认识和对其开放与否的讨论被正式掀起。当然，以前对中国（清）和日本的他者存在有一些间接性的认知，但这并没有威胁到朝鲜文明认同。

朝鲜最初能感到自己文明·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事件是（巴黎外邦传教会支援的）天主教。对于西方他者的出现，朝鲜 4 次严重迫害了天主教（1791 年辛亥迫害，1801 年辛酉迫害，1839 年己亥迫害，1866 年丙寅迫害）巩固维持了朝鲜文明的自我认同。这一连事件是对称为“洋夷”的西方他者的最初的国家应对。

朝鲜末期出现了擅权混乱，掌权的兴宣大院君提出“我们的是好的”的统治意识形态，对外强制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是通过禁止接纳西方外来文物来延续维持朝鲜认同的应对方案之一。大院君的闭关锁国意志由于后来朝鲜分别展开了同美国和法国的 2 次战争（1866 年丙寅洋扰）变得更强烈了。

当然，不仅是以兴宣大院君为首的统治精英有这样的排斥外来文物和思想的立场，以崔益铉为代表的许多在野儒教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之间也兴起了反对对西方文物开放的卫正斥邪运动。卫正斥邪运动是发生于朝鲜末期的社会运动，主张西方文物具有危险性，应排斥西方文物，维护朝鲜儒教传统。“卫正”是指维护正确的，即，呼吁维护性理学和性理学秩序，“斥邪”是指排斥邪恶的，即，除性理以外的所有宗教和思想。

这种极端的排斥西方文明意志最终导致朝鲜不能通晓当时世界权力格局倾向和文明范式转换，真实地揭露了朝鲜末期的落后。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反映了一种危机意识，即，当面对临着西方他者的侵入时，作为东方文明国的“朝鲜 style”陷入了文明的比较劣势状态。但即使那样，朝鲜不能否认本国的文明认同，虽然是毫无意义的行动，但可以理解为这流露出希望尽可能的得到西方他者对朝鲜文明 style 认同的愿望。

因云杨号事件，对朝鲜文明的认同要求自 1876 年和日本缔结江华岛条约之后一直持续下去。朝鲜政府对日本国力迅速崛起的认识和听到清朝在西方帝国的强迫下签订了北京条约的不幸消息，致使朝鲜不得不打开锁国的门环。1881 年，朝鲜分别向清朝和日本派遣了使节和调查访问团，1883 年，历史上首次采取了向美国派遣了报聘使使节团的开放措施。

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要求对朝鲜文明的认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朝鲜的一个代表性精英朴定阳初代驻美全权公使的态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和乘船横跨太平洋的朴定阳一起同行的霍勒斯·艾伦的记录虽然描写得赤裸裸了一些，但也很有意思。

朴公使是使节团一行人中最懦弱白痴的人物，（……）参赞官李完用和书记官李夏荣还算可以从整体上抵消使节团的不良印象。（……）他们的身上一直散发着难闻的大便臭味，他们在船舱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味加上不洗澡的体臭味、大便臭味、尿骚味、朝鲜食物散发的恶心气味，这些难闻气味混杂在一起弥漫着整个船舱。（……）我每天早上都向朴公使问安，把他们叫醒后就带他们去甲板，我现在因为恶臭再也无法和他们一起呆在船舱里，我指着他们衣服上爬行的虱子让他们注意捉虱子，提醒他们注意清洁卫生，但这毫无作用，恶臭还是持续弥漫着，一点都不减少。尽管如此，我还是以礼貌的态度对待了朝鲜使节团中的每一个人。（霍勒斯·艾伦，1887 年 12 月 26 日）

艾伦的记录带有浓烈的西方文明优越主义色彩，但他从发生甲申政变的 1884 年起，到缔结乙巳条约的 1905 年，在朝鲜生活了近 20 多年，是了解朝鲜的现实情况，并且为了朝鲜的独立和近代化倾注了很多努力的朝鲜通，他这样写虽然令人感到意外，但艾伦的这种描写应看成是作为 19 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他不得不具备的近代主义文明范式中不可回避的立场。不管怎样，艾伦赤裸裸地描写的情况象征着当面对当时西方强烈袭来的西方近代生活样式时，前近代朝鲜人的矛盾和困惑慌张感。

但在笔者看来，艾伦描写的朴定阳和他的随行人员的未开化行为不单纯是朝鲜前近代先进上层知识分子迂腐无知的产物，即，把他们的应对和行为与卫生概念的具备与否和未开化的(或已开化的)生活样式相关联是单纯地看待问题现象。朴公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表现出的行为是把对悠久的朝鲜文明认同的认同要求展现给包括艾伦在内的西方人的所谓“朝鲜 style”。

朴正阳是朝鲜有地位的两班，不怎么走出自己住的一等船舱，几乎一整天想要为了体现两班的体面，把时间都花在阅读儒教经典上。即使船舱里不能整理非常脏乱，朴公使通过展现出东方礼仪之邦的朝鲜上层的理性风度，想得到对有品格的朝鲜文明的认同。虽然不知道艾伦通过英语实力很差的翻译官李采渊是否能正确理解朴定阳看的东方古典内容，但可以猜到那些古典的内容应该是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旧韩末期，文明的认同危机和文明范式的转换

经历了朝鲜末期和旧韩末期，在以日本为首的列强强迫之下，朝鲜的执政者和统治上层醒悟到闭关锁国和卫正斥邪等方式不能成为根本解决方法，因此，之后开始实行积极的门户开放，接纳西方外来文物。正如前面所说，这些文明范式转换尝试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因列强的威胁和要求而产生的，但以国王高宗为首的大多数上层知识分子很早就看清了那些范式转换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事实。

最后，缔结了和西方各国的外交条约，缔约后积极地派遣了外交官和使节团。另外，在内部引进了近代官僚体制，全面废除传统制度和组织类型，开始设立西方教育制度，医疗机构，邮局或电信局等近代交通·通信基础设施。

最终，旧韩末的文明认同的危机和没落通过因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导致的乙巳条约和韩日合并显现出来。之后的近 40 年期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主导的殖民近代化措施的实行，接纳他者文物和制度在个人和社会制度的所有层面上强力展开。

文化冲击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变革的一般过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开放，被引进的(西方)近代主义文物与朝鲜的文物和样式相比，几乎大部分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这种认识从必然伴随着技术化和产业化的西方物质文明的伦理和标准来看的话，是不问自明的。

无论哪个时代，人们(社会)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遇到某种事情或情况时，都会选择有比较优势价值的。即，在很多方案中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更可取的”、“更珍贵的”、“更值得提倡的”、“更高尚的”、“更值得赞叹的”，与此相反，“不可取的”、“不尊贵的(庸俗)”、“不值得提倡的”、“微不足道的”、“可以蔑视的”

就排在了选择顺序的最后面。这种价值评价选择过程涉及到个人及社会·国家的所有领域，但这种选择不能成为具有绝对价值的最好和最优先选择，也就是说不能成为最终选择，原因在于会有不断的其他备选方案的介入与挑战，因而不能脱离这种“开放的竞争循环”情况。从这点来看，虽然这种比较优势选择过程说的是应对方案之间展开的竞争过程，但这种竞争与所谓的在歧视或憎恶的政治学基础之上的竞争或选择过程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观点也和库恩说的范式转换概念相通。和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转换一样，文明范式的转换如前面所说的，会伴随着落后于具有比较优势地位文明的文明范式转换，但前者的文明范式具有的比较优势地位也不能持久垄断。不仅由于前者的文明，也由于处于比较劣势地位的经历过范式转换的后者文明，以及其他的第三者文明样式的出现和挑战(根据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的价值评价选择)，致使经历接连不断的范式转换。

但对于韩国传统文明样式的比较劣势性的自我认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时期，韩国人的(无)意识中被鲜明的内在化了，即，“我们的是卑微的”自我文明卑下意识。这种意识的普遍化不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近代化过程相关连，也与解放以后韩国近代化过程中从制度政策上自上而下实施的对外来文物的开放和接纳密切相关，即，作为为了成功实现近代化的一种统治意识形态，要展开对外来文物的开放和积极接纳是不可避免且正当的逻辑，这当然是与以传统文明的比较劣势性为前提的议论产生相连接的。

但尽管如此，个人生活方面对外来文物的开放和接纳常常不是积极和顺利的，尤其群体固有的文化倾向或习俗无视制度·政策变化，拥有着和僵尸一样的复原力，儒教聚合文化情感的延续现象就是代表性例子。这种包含消极和积极两面性的集合文化情感如

Robert. Bella 说的“心理习俗”一样发挥作用，束缚着现代韩国人的生活类型化和政治学。也许这种文化习俗已经通过在旧韩末以后持续进行的西方文物接纳变成机构化的新韩国文明范式的一部分。

由文明范式的绝对“接纳者”到“开放的传播者”

用一句话来说，从旧韩末以后开始的(韩国式)近代化加快了制度·政策及个人层面开放的步伐，但在这过程中，是付出对本国文明认同的自我卑下认识的代价才实现了对外来文物的接纳。但如今的韩国和这不同，现在已超越了贬低自我文明和模仿外来文物的水平，经过文化变革过程，变成了传播新韩国文明样式的文化传播者。

这意味着主体性·主动性的文化开放变得可能，这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意味着在世界文明环境中，韩国文化样式在和其他社会或文化的竞争中占据着比较优势的价值。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商业资本主义文化及技术样式领域占据比较优势地位，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了。其代表性例子就是以韩流现象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内容样式的传播和得到全球市场上最高品牌价值认可的大企业的尖端技术样式等。

“模仿就是创造”，这句话对韩国情况来说正合适。事实上，过去我们讽刺日本人的模仿能力，但我们也和他们差不了多少，不管哪个国家或社会不经历“外来文物的挑战→开放与接纳→范式的转换→通过范式转换的文化变革→新文化的创造”过程的话，就无法生存。最终，我们郁愤不平的旧韩末以后接纳开放和外来文物的屈辱历史算是当今韩国社会创意性的基石。

21 世纪的文明和 19-20 世纪有着根本不同，世界化和混合化同时进行。托马斯·弗里德曼把这种情况称为“世界化 3.0”的时代，国家和社会间的相互依存性更加深化。尤其，规模较小的小群体或个人的作用也变得突出，在这种文明环境中，当然要求要有对变化的迅速开放/接纳和变革。

今天的韩国人正在成功的应对这种文明转换情况，至少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尖端技术领域，被评为能够积极主动接纳新事物的且变革速度快。2012 年世界经济论坛 WEF7 和瑞士国际经营开发研究院 IMD8 发表了韩国的国家竞争力分别居第 19 位(共 144 个国家)和第 22 位(共 59 个国家)。这虽然是宏观的分析，但这些研究机构共同分析指出韩国的强项为经济的效率性和结构，以及发展潜力和革新。这些分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韩国国家竞争力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尤其积极评价了韩国竞争力构成要素中的创意性要素。

在世界化和混合化反复进行的 21 世纪文明转换中，个人或企业发挥的创造性和迅速接纳新事物的开放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函数关系。(虽然韩国人仍然不满足)这意味着韩国人的接纳及变革能力如此之强。

但今天的韩国人仍然没能拥有充分的自我文明的比较优势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韩国人对新事物的开放性(包容力和接纳力)仍然追随比韩国优越的先进国家的轨迹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先进国成功的先例，就害怕接纳新事物，由此拉了韩国人的后腿。

另一个封闭性是前面提到的植根于儒教血缘主义的文化习俗产生的排他性集体主义倾向相关联，即，我们对与我们群体或认为自己所属的主流群体不同的新事物(肤色、取向、理念、学历、出生地、少数人等)不能开放。更准确地说，可以说对它们表现出极端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如果说这种封闭性是在韩国文明转换的历史脉络中残留下来的残余。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为了成熟的开放，要让文明进一步变得更加成熟的课题，这也许是为了实现对其他新事物积极主动开放的充分条件。

韩国青少年的生活世界

幸福是成绩名次吗

幸福的字典释义为“感觉到满足和快乐的状态”，这种满足和快乐的状态常常出现于在自己希望的东西被获得或成就的时候。一般来说，幸福指数表现为期待标准和实际标准间的差异，是因为有的人原本期待活到 80 岁却活到了 90 岁的话，比原本期待活到 90 岁而活到 90 岁时更能感觉到幸福感。

由于幸福感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根据情况和条件有相对性也有很大的个人差异。另外，对同一个事件或情况根据是否用某种价值观或评价标准去判断，感觉到不同的可能性很高。

这一章节内容是以回答“幸福是成绩名次吗？”问题的形式构成的，为此先提到了成绩和成绩名次，再分析了幸福和成绩名次的关系，最后提到了是否有让未来更加幸福的成绩处理方案。

成绩和成绩名次

所谓“成绩”的字典释义为“作为一种学业成果，学生们得到的实绩或评价其成果的结果”。常常以满分 100 分的分数表示，或以“秀·优·美·良·可”或“A·B·C·D·F”评语来表示，也以 1~9 等级来表示。这种成绩用以评价个人的学业成就程度，不仅大大有助于准确的把握自己的现在状态，也被活用于以后以怎样的方式去努力才能提高学业成就的基础资料。

一方面，所谓“成绩名次”是指根据成绩排名，也常常称之为“席次”。虽然是来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按照成绩名次来安排教室的座位顺序，但如今也常常用于班级席次、年级席次、全国席次等方式。不管在哪个国家都经常使用按成绩排名的方式作为参考，但按成绩名次来给学生排座位的方式是只在我们国家经常使用的罕见方式，这种方式使得原本不容易向他人显露的学生个人的成绩名次由于班级内的座位位置变得容易对其他学生或老师显露出来。这种排座位方式虽然是一种公开个人信息的人权侵害行为，但解放以后也常常被使用，现在在一些学校里，不仅是班级的座位布置，校内图书馆的座位布置以及宿舍房间的安排布置上也使用的很多。

成绩名次或席次尽管是一种私人信息，但以很多方式公开，另外，从根据成绩名次或席次的奖学金等金钱补偿到排座位或宿舍房间安排等班级环境的差别安排，根据成绩名次或席次的差别安排频繁发生，因为这个原因使我们国家经常提出“幸福是成绩名次吗？”的疑问，已经意识到这是重要的社会问题。

幸福和成绩名次的关系

先从结论来看的话，幸福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成绩名次，此外，其感觉可以是相对强或相对弱的，是因为幸福感根据特定情况下某种价值观和标准的介入变得不同。

我们国家的学生在学校生活过程中，根据多么重视成绩和根据成绩名次被给予多少差别补偿，学生们的幸福和成绩名次相关关系就会出现不同。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学生的学校生活非常整齐划一，此外，学生父母们希望孩子在学校得到的成就也就是学业成就。如此一来，我国学生的学校生活成功与否主要倾向于通过学业成就，即，成绩来

体现，这种情况使得学生们很重视学习成绩。因此，有的学者指出想让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变得幸福的话，学习成绩必须要好。学校的教育目标越统一为学业成就，另外，学生父母或学生越认为在学校生活中需要实现的教育目标只是学业成就的话，学生们的幸福就越来越等同于成绩名次。

另一方面，由于幸福感是相对的，比较对象越具体，其感觉的强度也会变强，尤其，其强度和自己有相似的条件或情况的其他人相比较或竞争时，其感觉强度就会有变得更强的倾向。因此，在和竞争者比赛胜出时，就会更感到瞬间波动的幸福。相反，战败时就更会有不幸福的感觉。

最近，在我们社会中经常提到妈妈朋友的儿子，妈妈朋友的女儿，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把自家的孩子和妈妈朋友的儿子或女儿作比较。关于自己的成绩，如果是和邻国的中国学生比较时，是不怎么会感觉到相对的幸福或不幸福的，但如果经常和妈妈身边朋友的儿子或女儿比较的话，相对的幸福感和不幸福感就很强烈了。

例如，在平时英语考试中做错很多道题目的某学生，在今天的英语考试中只错了一道题的情况下，可以用以下情况来上演。

“妈，我今天的英语考试只做错了一道题，很棒吧？给我点零花钱作为奖励吧。”

“是吗？我儿子好样的！零花钱当然没问题，给。”

.....

“对了，楼上邻居家的哲秀考了多少分呢？”

“哲秀一题都没错。”

“是吗，那隔壁家的金秀和恩秀考得怎么样？”

“金秀和恩秀好像也都全对。”

“那楼下邻居家的东秀呢？”

“听说东秀也全对。”

“什么？那你们班没有全做对的人有几个？”

“好像只有我一个吧。”

“什么？那么你是倒数第一吧，把刚刚给的零花钱还回来。”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事例。比较儿子的平时成绩和今天的成绩的话可以持续这种幸福状况，但在和妈妈朋友的儿子做比较的瞬间，妈妈和儿子都被转换到很不幸福的状况中。我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相比时，在语文，数学，科学等方面可以看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学业成就度，但实际上学生们的学校教育满足度或对所属学科目的兴趣度却停留在世界最低的水平。这样的现象展示出我国教育的优点和缺点。

根据这些议论得出结论的话，可以说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学生们的幸福与先进国家相比相对的更多取决于成绩名次。

可以带来幸福的成绩处理方式

在我们国家，可以说学生们的幸福成为成绩名次的可能性很高，目前情况下，感觉学校生活不幸福的学生要远远多于感觉学校生活幸福的学生，原因是我国学生父母和学生的期待标准非常高，满足于一般的成绩或排名的人几乎没有。

那么在学校生活中，如果取消考试，学业成就度评价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没有成绩也没有排名，大家会变得更幸福吗？问题在于没有考试的学校就不能算是学校，只能算是游乐场和旅游区，原因是因为学校设立的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们通过辅导·学习活动取得优秀的学业成就，另外，还由于在学校评成绩是为了改善发展辅导·学习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在学校评价学生们的学业成就，即，成绩是为了履行以下四个功能。

一，作为检测功能，更好的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实况，即，学校教师为了更好的教学生，事先全面的观察学生们的预习水平、学习的不足、学习障碍等各种学习状态。

二，作为形成功能，为了在辅导·学习活动进行过程中，通过期中测试从而促进更有效率、效果更佳地完成学习目标，即，为了修正·完善进行中的特定辅导·学习活动，或必要时探索其他应对方案。

三，作为总结功能，某个辅导·学习活动完成后，评价对这个活动的最终成果。总结是指总括个别的，总结大大小小的成果，并进行综合评价。

四，作为勉励的功能，为了达成特定辅导·学习目标进行的诱导和鼓励，即，通过评价学生的特定科目的学业成绩，诱导和鼓励努力提高个别学生的该科目学业成就度。

因此，可以说学校取消考试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果学校废除考试的话，就是因噎废食的愚蠢做法。那么怎样做才是可取的呢？有句话说“不能避免，就享受吧”，如果考试是学校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把它改善成给更多人带来幸福的方式是重要的。

第一个改善方案是摒弃助长过度排他性竞争的等级为主的相对评价，追求重视成就水平本身的绝对评价。所谓相对评价是指把自己的学业成就度与同学的学业成就度做相对比较，算出以等级为主的成绩。例如，我考了 80 分，其他学生都低于 80 分的话，我就是考得最好的。所以这种方式不是我的分数重要，而是一起考试的同学的分数更重要的评价方式。那么一起互相帮助一起学习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成绩，而其他学生在玩，只有我在学习才是更有利的，只有我自己知道的东西越多的话就越有利的一种评价方式。因此，如果扩大·强化等级为主的相对评价，就会助长学生间的排他性竞争，其结果是学生们的幸福感像零和博弈一样原地踏步。

相反，所谓绝对评价是指不把自己的学业成就度和同学们的学业成就度做比较，根据事先设定好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的方式。例如，100 米赛跑时，如果不测定时间，而是把重点放在谁跑的更快，那这种方式就是等级为主的相对评价，但等各自跑完 100 米后，把重点放在利用秒表测定跑完的时间，这种方式就变成绝对评价，这时的评价标准就是跑完的时间。举个相似的例子来说，在数学考试中，不是比谁考得更好，而是把重点放在在该考试中考了多少分的成就水平本身，这就是绝对评价方式。如果扩大强化这种绝对评价方式，不会引起学生间的排他性竞争，反而会重视为了提高成就水平的自发性努力，其结果是学生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幸福。

另外，在相对评价中，即使教师不特别地去努力执行辅导·学习活动，学生们的相对等级随时都可以掌握，但在绝对评价中，学生们为了考到更高的分数，教师和学生

为了执行更有效的辅导·学习活动必须一起努力。因此，摒弃助长学生间过度排他性竞争的相对评价，更加扩大强化绝对评价，让更多的学生在学校生活中体会到幸福感的同同时，学校也要更加教育力度。

第二个改善方案是从对学业成就的个人为主评价转变为能扩大促进学生间合作与协作学习的集体评价。过去，我国的教育不能很好的培育出“有关爱和分享精神品格的创意性世界人才”，其理由之一是为了个人的立身扬名或家门的荣光的个人为主教育在我们社会过度的扩散。说我们社会适应的教育目的、内容、方法、评价都带有那种取向也不为过。当过度的只重视自己时，对他人的关心和分享就会减少，每个人体会到的幸福感也会减少。

那么现在必须要转换成以生态学观点上的共同体为主的教育，因此，在学校强调分享和关爱的精神，同时要摒弃评价学生时过度的以个人为主的评价，有必要通过小组课题或活动计划积极引进集体为主的评价。打个比喻来说，最近人们对鸡窝里不再飞出金凤凰感到惋惜，但从生态学观点来看，从鸡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只有那只金凤凰能升天，剩下的还是脏乱的鸡窝，与其想象这些，不如去搞好鸡窝的环境，把鸡窝打造成所有成员能够生活得更好的场所，这才是更重要的。必须认识到每个人的幸福感在一起分享时会更加得到提升，应该要积极努力营造学生间的合作·协作学习氛围。

第三个改善方案是不应该让教育内容和辅导·学习活动变成单一化，而是多样化，不是通过一种成绩来评价学习成绩，而是通过多种成绩来评价。

如果奥运会金牌只有一个的话，那就是只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幸福的奥运会。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由于有 26 个种类，302 个金牌，所以有很多人参与且为此狂热，大家都体会到了幸福，这一事实对我们有很多启发。

即使幸福可以等同于成绩名次，但为了让更多的人幸福，可以把成绩种类多样化。如果学校教育被统一化，只存在一个成绩的话，那么就会局限于只有几个人才能感觉到幸福。所以，要使学校教育多样化，不要以一个成绩来评价学习成绩，而是努力根据多种科目或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评价学习成绩。不要总括性的提问“学习好吗”，而是应该一起努力营造提问“什么内容你更清楚？”或“擅长什么活动？”等细节的氛围。

用多种成绩来评价学习成绩

现在在我国，因为考试成绩，在学校感到不幸福的学生比感到幸福的学生更多，但是取消考试和成绩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可以弱化学生的幸福和成绩名次的关系，但不能完全使这两者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充分执行学校功能的同时，不断的努力维持学生幸福和成绩名次关系的适当强度。

为此，应该努力摒弃排他性竞争的等级为主的相对评价，扩大·强化绝对评价，摒弃心理学观点上的个人为主的教育，转换成生态学观点上的共同体为主的教育，并且摒弃学校教育的统一化，促进教育内容和辅导·学习活动的多样化，不是以一个成绩来评价，而应该是以多种成绩评价学习成绩。

私人教育是什么现象

很多人认为私人教育是我们社会存在的痼疾，称私人教育是破坏教育的原因，也有人说这是由国民们错误的意识而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如果把私人教育单纯地看作是父母对子女教育下功夫的一种现象和学生们想要在学习成就竞争上取得领先而付出的努力，其实没必要这样消极地看待。在其他国家社会也有私人教育，却对此不怎么批判，当然，在我们国家社会中，由于私人教育近乎病态的过度存在，人们会认为应该把它看作是问题，但把那种认识和判断本身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构成社会性意义的现象)的话，看待私人教育现象不能一直停留在传统观念，有必要深入思考一下。

私人教育的意义

最近在我们社会，“私人教育”这个词语被广泛使用。在新闻报道上搜索一下这个单词的使用事例的话，可以发现出现这个单词的最早报道是在 1963 年 5 月 25 日，即，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私人教育”这个词语在我们社会是不经常使用的，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私人教育”这个词语才被广泛使用。

以前“私人教育”所指的教育行为大体被称为“课外”。在我们社会，这种“课外”被当做问题的历史还很长，仅通过查找以前新闻报道的方法来确认，就可以发现私人教育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1930 年 5 月 6 日《每日新报》3 版刊登了在庆尚南道给各个学校校长下了“管控课外辅导”书面通知的报道。这是因为“长时间的课外辅导给儿童带来严重的卫生健康危害”而采取的措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可以常常看到这些报道，始终把“课外”看成是一种带来“保健和精神上的严重危害”的问题。

由上述的报道可知，“课外”被认为是违反教育目的的行为，而开始使用更模糊的“私人教育”来取代“课外”，至少有两个倾向发挥了作用。首先“课外”这个用语不再适合用来指称这种现象，大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为止，“课外”是指教师或大学生在学校课程以外的时间辅导学生的行为。但之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上学率的升高，“课外”市场也迅速扩大，服务形态也很多样化。辅导班和专职讲师服务很早就成为了普遍现象，利用辅导材料和播音，以及网络等各种各样媒体的服务也成为了大众化。另外，比辅导-学习服务更进一步，出现了为了资历的咨询和活动介绍服务，诸如此类的各种服务都用“课外”这一传统用语来表达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舆论或政策议论与其说把“课外”现象看成是教育问题，更多的是倾向于认为是费用(负担)问题。不是关心“课外”从教育上会带来什么问题和想要从教育上变为可取的话该怎样去改变，而更多的是重视“课外”费用给家庭经济情况造成负担和痛苦和如何减少这种负担和痛苦。

私人教育的韩国特征

我们社会接受把这种私人教育看成是韩国的现象。一般认为像我们国家一样战略性的利用“课外”培训或升学考试咨询等服务,激烈竞争成绩的国家在世界上很难找。像这样竞争激烈，“课外”盛行的缘由常常是因为我们国家独一无二的教育热。另外，在说明教育热为什么在我们社会如此之高时就会提到历史和传统(文化)。贯穿朝鲜时代形成的儒教传统植根于重视教育的观念，通过士农工商的位阶秩序和科举制度任用人才的历史经历等加剧了教育竞争。

对于“课外”，乍一看有些方面可以被认可，不管怎么说，可以看作是教育热度征兆的“课外”辅导行为在韩国和日本，以及最近在中国等儒教文化圈的东亚地区特别的活跃，这的确是事实。另外，这个地区的成绩(尤其 升学考试)竞争比其他地区有尤为激烈，也许是因为这样(因果关系虽然不分明)，所以在“PISA”等国际学历评价比较中，这些地区国家常常位列世界前茅。

注意到这种现象的话，但如果从更宽广的范围来看，把我国的私人教育盛行现象认为是植根于历史的我国文化产物也似乎是妥当的。但拓宽观察的范围来看，可以知道是很难单纯地去说明的。“课外辅导 private tutoring”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且在不断地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也承认“课外”辅导已成为了在教育或人力政策方面需要慎重考虑的普遍现象。据这些报道显示，“课外”辅导不仅在美国和英国等先进国家，还在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在越南、中国和东欧许多国家等最近实现体制转换的国家也广泛出现。因此，很难说我们国家是“课外”特别盛行的国家。

“课外”辅导发展的趋势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间没有什么大差异。“课外”在城市比农村，富有的家庭比贫穷的家庭更常见，针对在竞争上比其他科目更具战略性的语言(国语，英语)或数学等“道具”科目的“课外”更多，另外，比起小学阶段，初中高中阶段的“课外”辅导频度更高，这些也和其他国家相同。

这样来看的话，与一般认为的教育不同，我国的私人教育现象和其他国家相比时，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但稍微更深入地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也不是没有特别之处，特别之处就是在我们社会是以怎样的目的来进行私人教育行为的呢？有分析结果指出我国的“课外”成为一种为了在激烈竞争中取胜的战略，和给优秀学生进行再投资的行为。而

其他很多国家的“课外”辅导是被用于针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的“补充”战略，与此相比，在我国倾向于被运用为“强化”战略。据以 41 个国家为对象的调查研究表明，在丹麦、荷兰、瑞典、挪威等“福利国家”的“课外”大体上被用于支援学习成绩差的方法。相反，在这些国家之间，(在同一范围内，罗马尼亚和泰国也包含在内，也比这两国更为突出)我国的“课外”更明显倾向于被用于提高成绩的方法。与其说是因为学习不好才接受“课外”，更多的情况是为了不落后或更领先才接受“课外”。

从我们的日常经历来看，这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承认的结果，这是很难否认的。不管在家庭或在学校，在我们社会做和“课外”一样的一种教育投资时，在学习不好的学生(子女)和优秀学生(子女)间，试想一下会主要投资哪一方呢？高中学校有化分优劣班级，对“有可能性”的学生更加集中于升学指导，这在我们社会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了。也许这些认识为我们社会的私人教育行为奠定了基础，认可这一观点的话，我国私人教育现象的特征就可以认为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无情的。

韩国私人教育的内幕

对于我们社会盛行的私人教育现象，经常被解释为传统上科举制度的记忆或教育热。但这种说明更增加了疑问。科举制度的痕迹是怎样维持至今还具有的影响力呢？我们社会的教育热大致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些疑问一直被持续提出。

一个社会的主要行为趋势明显是其社会文化孕育出来的，其文化终究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私人教育这种在我们社会成为普遍化的行为也是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因此，认为基于我国历史和传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认识也不能说是错的。但与此同

时，想把对私人教育的理解线索与历史和传统相衔接的话，在讨论过去教育热的历史和传统中的原因之前，对所谓私人教育的行为，找出更贴近的原因(行为理由),深究它们是以什么样的历史轨迹而形成的，这才是正确的顺序。

最近有一些分析可以让我们大略推测出导致私人教育盛行的原因，那就是前面引用的关于“课外”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在美国等多民族国家进行的按民族(人种)分类的教育行为比较研究。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思考私人教育在我国具有竞争性和盛行的原因的话，可以说出以下三个相关联的原因。

首先，判断社会竞争的依据集中于教育时，私人教育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如果与其他部门相比，教育部门受到的认可是社会生活的关键的话，人们当然在教育竞争中使出全身力量。如任何人都承认的一样，我们社会非常重视在教育上的成就，不是顺利毕业的话就很难得到别人的礼遇。从职业机会到日常人际关系，以及生活伴侣,几乎生活的所有条件都被教育成就大大左右着。如果说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财富和权力，威信等综合决定的话，在我们社会，这三个条件的具备是由教育成就决定的。没有学历的话就很难具备那些条件，但即使具备其中某一个条件，没有学历作为垫脚石的话，这些条件在对等的程度上就变得无意义。不学习而只是有钱的话，一定会被称为“暴发户”，即使晋升到有权力的地位，学历跟不上的话就一定会被认为是政治掮客，对于不学习的人很难被赋予威信，在这种社会形势下，私人教育的热潮只涨不退的原因在于在教育竞争上的胜利和人生各方面的成功没有差异。

即使说教育竞争是人生的前途的核心，无论是谁都不会鲁莽地参与其竞争。认为在竞争上有一定的胜算才会参与，几乎没有胜算时不会盲目的扑进去。因此，我们社会教

育竞争激烈的事实意味着认为在竞争中会胜利的人居多，换句话说，事先放弃竞争的人较少。

国际比较研究对于这一点用宗教背景进行了说明。在基督教背景社会中，认为教育上的胜败取决于“天赋”，相反在儒教背景社会中，认为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在前者情况下，如果失败可以归咎于天赋，而后者的情况下，只能全部认为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即，不能避免由于努力不够导致失败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尽最大可能倾注努力的途径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最后，即使说教育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可以根据其竞争范围被扩大多少，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变得不同。如果说参与竞争的结果所影响的范围仅局限于个人的话，那种竞争的影响面还是有限的，但由于教育竞争的当事人大体上是青少年，最终，竞争的热度取决于给青少年提供后援的父母或家族、以及亲朋好友等，取决于他们为竞争做了多少铺垫。

在我们社会，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竞争与其说是当事人的竞争，不如说是父母的竞争。儿童·青少年没有空闲去思考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价值来参与教育竞争，和他们的意志无关，父母把他们推进竞争，动用所有资源支援他们的竞争。当然，父母的这种行为也不是他们乐意做的，虽然痛苦，但是不得不那样做。在我们社会，积极参与子女的教育竞争被认为是“父母的职责”，所以父母只是想最大可能的尽职尽责。最终，我们社会所形成的“父母职责”观念使得父母不可避免地参与竞争。

私人教育问题的核心

私人教育是既普遍又特殊的现象，不管在哪个社会，教育竞争是生涯竞争的核心，私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竞争的战略在世界各个地方兴起。因历史和传统，社会体制和架构等存在差异。正如前面观察的一样，在我们社会认为在教育上取得的所有成就最为重要。在这种社会文化风气中，人们应该对教育竞争付出一切。加之，在我们社会，认为父母职责的核心就是提高子女的成绩，这种思想把整个家族拉进了教育竞争。在与此类似的背景中，韩国社会的私人教育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面貌。

在我们社会当议论到私人教育时，主要关注于我们社会的特殊性。说私人教育在我们国家是特别的、病态的，对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异议。因此，在寻求应对私人教育问题的对策时，总是聚焦于如何去除私人教育行为，但是私人教育已经成为了普遍的事实，与其视私人教育行为为问题，应该注意的是有必要把它当作已成事实来看待。即，与其消灭它，不如将其行为的经纬依据社会意见去议论，尽力将其提到正确的行为路径上来才是合理的做法。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一样，私人教育已经成为父母教育子女的普遍行为，另外，把所谓社会位置决定的人类社会的普遍条件视为是以教育竞争为前提的话，不管在哪个社会，必须接受私人教育现象的发生是必然的。虽然每个社会的独特因素会因现象的性质和外形而不同，但只关注于这种差异去看清私人教育的普遍性性质是不可以的。

我们议论到私人教育问题时会关注于费用或负担问题，埋头于减少这种负担是因为忽视了它的普遍性性质。若关注到私人教育的普遍性的话，重要的不是它是否会给人们

造成负担，而是通过它是否体现了正确价值。不是对私人教育少花钱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作为私人教育的结果，使人们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社会的私人教育现象被认为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由于对其特殊性的争论在过度的增加，掩盖了私人教育的价值和本质。好像以为在学校做好升学考试准备的话，就可以终结私人教育的问题，这可以从政府政策上来看它的侧面，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思想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私人教育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私人教育问题的核心与其说是费用或负担，如果形成把它视为“非教育性”的认识的话，我们社会的私人教育可以探索出对策性的发展道路。

韩国青年失业的特殊性

青年失业的严重性

2008 年开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世界，随之世界各国的青年劳动市场出现了急剧变化，尤其主要国家的 15 岁~24 岁的青年失业率从 2008 年开始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OECD 国家的平均成人失业率，与 2008 年第一季度相比，2012 年第一季度只增加了 2.3%，同一时期的青年失业率却增加了 4.3%，增加了近两倍。尤其以 2011 年为基准，西班牙、希腊、爱尔兰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 46.4%、44.4%、30.3%，之后，失业率也毫无减少。韩国的近邻一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出现青年失业问题的长期化及结构化征兆，以尼特 NEET 族(不接受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无业青年), 飞特族 Freeter 族(通过兼职或小时工赚钱的 15~34 岁的劳动者)等为代表的青年就业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国的青年失业率和 2008 年开始失业率急剧增加的 OECD 主要国家不同，经历 1997 年 IMF 经济危机后失业率剧增，相关问题开始凸显。1998 年失业率达到最高，之后又渐渐减少，从 21 世纪 00 年代初期开始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 2011 年，我国的青年失业率为 9.6%，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 16.2%。但我国的青年就业率约为 25%，明显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约 40%。即，虽然我国的青年失业率较低，但青年就业率从 2004 年以后呈持续减少趋势，远远低于 OECD 国家。出现青年就业率低和青年失业率不高的原因是大多数青年由于学业、从军、毕业推迟等原因不被包括在经济活动人口之内，因此，在 OECD 国家中，我国的青年就业率很低，青年失业率实际上也很高，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青年失业更加严重的问题是 25~29 岁的青年失业率不断增加。2010 年和 2011 年 2 月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失业率高达 40.1%，据最近统计厅的青年就业率调查显示，2012 年 12 月的 20 多岁的就业者对比 2011 年 12 月减少了 79000 名，考虑到人口增减效果，再加上 2 万名的话，就变成 99000 名。尤其，由于 20 岁出头的高中生就业扩大和兼职机会的增加，就业者稍微有所增加，但 25~29 岁的就业者即使除去人口减少效果，也减少了 78000 名(2.3%)，从 2012 年 6 月以后呈持续减少趋势。因此 查明青年失业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在韩国又有怎么样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且有必要的。

青年失业的原因

青年失业的原因可以从劳动市场方面和非劳动市场方面来分析，劳动市场方面分为需求侧因素和供给侧因素，非市场方面分为失业持续机制因素和制度因素。

首先从劳动市场方面的需求侧原因来看，前面说明的造成青年失业的背景—经济停滞，导致了劳动市场的总体就业岗位减少。其中，受到最大打击的就是青年层，在全世界，青年失业与成年失业相比对于经济景气的变化更加敏感，这是因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式职业的大多数人属于青年层。青年层随着经济的复苏是最后就业的，也随着经济的开始停滞，最先被开除的倾向很大。另外，最近大多数企业由于经营环境得不到改善，以及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减少任用新人，而是更偏好于任用有工作经验的人，由于这些现实情况，导致了青年层的就业岗位创出率要低于其他年龄层。

作为供给侧的原因，提出了从学校转移到职场的问题。由于大学教育只重视探索学问的本质，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不能具备劳动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他们进军劳动市场起

因于青年层就业岗位创出率的降低。在我国，从理论上来说，由于低出生率造成的人口规模变化和经济活动参与率变化，导致青年劳动供给全面减少，由此青年失业率也处于较低水平，但实际不是那样，其原因不是数量供求不均衡，而是质量供求的不一致。

关于青年失业的原因，随着青年层的未就业情况长期持续，很难仅从劳动市场方面说明其原因，反而认为非市场方面是更重要的原因。非市场因素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去的未就业经历对未来的未就业产生影响的失业持续机制。失业持续机制表现为“烙印效果 stigma effect, scarring effect”以及“状态依赖性 state dependence”等，据姜顺熙·安峻鎬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失业烙印效果的存在，过去的失业经历对现在的失业经历造成影响，导致青年失业反复出现。与此类似的效果和国际劳动机构报道的一样，如果青年人失业一次就会长期陷入长期失业的恶循环。

和失业持续机制一起，制度因素也是恶化青年失业问题的非市场因素。前面提到了有经验人员的雇佣增加加剧了青年失业问题，有经验人员雇佣增加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法律·制度层面的僵硬雇佣惯行、劳动组合（工会）的雇佣保障、以及快速提高工资的要求等。企业解雇现有劳动者是不容易的，又被要求持续调涨工资，所以对人员雇佣格外慎重，即使雇佣也要雇佣有生产性的经验人员，而被证实为不具生产性的新人求职者就更难就业了。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青年失业，由此衍生的问题又再次对长期化失业造成影响，从这点来讲，在一定时间内，应持续将其影响力视为要观察的一连生活经历，因此，如关注其原因一样，青年失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青年失业的影响

首先从青年失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来看，青年失业会造成社会保障体制的追加费用和收入的减少。青年失业增加也就意味着纳税者的减少，这就造成不能确保用于国家运营和社会保障的税金充足，尤其是当充满充沛的工作积极性的青年劳动力退出劳动市场时，就会招致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负担的后果。

青年失业还因缺乏技能劳动力，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力量不能被利用，由此产生的无效率资源利用招致了国家财政损失，尤其青年时期失业的生产性损失远远大于中壮年层和老年层。此外，高学历者更多倾向于选择低标准就业和与专业无关的职业，这导致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费用的浪费。另外，当国内就业失败时，将可能迈进海外劳动市场，这就招致了国家人力资源的损失。

青年失业有可能发展成为社会不满，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随着社会老龄化和青年失业的增加，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也渐渐升高，引进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退休年龄延长政策等措施更加重了青年失业，有可能暴露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

另外，青年失业可能会通过自杀或犯罪增加等现象威胁到社会安全，由于青年层的失业持续机制，导致贫困工作层大量出现的危机。除此之外，青年失业会致使结婚推迟或停留在未婚状态，由此引发的低生育率会带来国家人力的减少。

青年失业除了会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还会给个人带来更加严重的问题。如果个人不能从学校顺利过渡到职场，就会使教育投资费用不能迅速回收，从而增加了个人的负债。尤其，我国的大学生由于不能偿还学费贷款而沦落为信用不良者，这不仅对未来的就业和创业造成妨碍，也引发了连利息和本金都偿还不起的恶循环。

尤其是经历过青年失业的个人，由于经济·社会的冷落和社会·心理的负担，面临着长期落伍于经济活动的危险，从短期角度来看，会使工作收入下降；从长期角度来看，会阻碍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减少生平的收入所得。青年层由于失业带来的机会成本比其他阶层相对较高，一走向职场就面临着失业的话，致使他们丧失工作热情，从而强化了失业持续机制。

青年失业也对个人的精神造成影响，导致自尊心下降、忧郁等情绪问题、对生活的满足度低下、药物滥用等颓废溃败行为和饮酒问题等。此外，青年层的长期失业面临着被社会排除的风险，对个人的心理安定和精神健康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形成固定化、结构化问题。

青年失业对社会或个人造成的影响不是短期问题，它具有从结构上被持续反复的特征。青年人们通过创造可以工作的条件降低青年失业率的事情是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紧急的课题。但我国的青年失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呈现出高学历者的青年失业率较高的独特特征。

我国的高学历青年失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青年失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高学历者失业偏多。OECD 国家或 EU 国家呈教育水平越高失业率越急剧减少的趋势，相反，在我国，即使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也不见失业率的减少。另外，在 20 多岁的青年失业者中，2009 年~2010 年，大学毕业以上的高学历者的比重超过了低学历者的比重，呈持续增加趋势。

“不错的工作岗位 decent job”的减少可以说是造成我国高学历青年失业的劳动市场方面的主要原因。所谓不错的工作岗位是指可以长期工作，基本的福祉得以保障，可以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在就职领域工作很久的话，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或得到成功，也就是能够预见“前途的发展过程”的工作，而在我国，大体上把就职于大企业的工作看作是不错的工作。但是，由于大企业的新人雇佣规模逐渐减少，对偏好于不错的工作的高学历青年层供不应求。

作为劳动市场方面的需求性因素，高学历青年的眼光高是主要原因。现在经历着经济增长放缓期的大学毕业生仍然偏好于过去只有当时少数大学生拥有的工作，这导致了青年失业问题的深化。2012年下半年，我国上市企业的大学毕业新人入职竞争力为28880个工作岗位招聘中，共有2551165人应聘，竞争率为平均88:1，相反，65.4%的中小企业即使发布了招聘公告也招不到职员，89.1%招不到满意的人才。

高学历青年失业也受到非市场性方面的失业持续机制因素的影响。失业持续机制是造成高学历青年失业固定化的主要原因，教育水平高的青年的失业时间相比教育水平低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持续的时间更久。这些条件中，大学毕业生为了回避较高的青年失业率选择继续上学的情况，导致青年失业率出现更深化的现象。

从制度因素来看，高等教育的膨胀和劳动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可以作为原因。高等教育的膨胀是因儒教文化圈所具有的对教育的欲求，婴儿潮现象，经济增长，对私立学校高等教育比重的扩大，政府的大学招生政策的改变等导致的。高等教育的盲目膨胀使社会进入到大学生泛滥的时代，但求职者的就业途径主要是靠关系或亲戚朋友介绍，通过职业教育和训练等途径就业的人少之又少。

由于像这样高学历青年层的高眼光，以及不错的工作岗位对新人任用的减少，导致出现质量供求不一致现象，还因为制度因素等，我国的青年失业成为个人或国家都必须克服的重要话题。

我国高学历青年失业的克服方案

为了克服高学历青年失业，需要尽快创出高学历青年层希望从事的理想工作。为此，需要努力通过调整公共机关和大企业的青年雇佣率，缩短工作时间，扩大社会服务公共化及工作岗位等来扩充就业岗位。但由于理想的工作是有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事的，所以需要努力通过创业及企业活性化、海外就业等来补充就业岗位。为此，需要在社会企业等各种领域，对 1 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行政·财政支援，大幅扩充学校企业，发展工作岗位创出型学校企业。另外，为了顺利的海外就业，需要支援增加海外实习，举办海外就业博览会，让青年层的求职视野能够脱离国内扩宽到海外去。

另外，随着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社会报酬差距的深化，导致出现高学历青年失业现象，因此，对中小企业的支援及培育是急需的。在我国制造产业内，根据产业规模形成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收入两极化深化的现象，除了 1997 年前后以外，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和国民收入两极化不同，不但毫无减少，而且持续增加，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但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候选人们对中小企业的支援及培育都表示非常关注，而总统当选人和总统职交接委员会所进行的现场访问，第一站就访问了中小企业中央委员会，并且第一次听取报告就表示要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援·培育，因此我们期待这可以成为克服青年失业的契机。通过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积极支援和培育，使中小企业的财政、福祉、教育方面提高到和大企业对等的水平，必须为中小企业能够积极任用高

学历者创造条件。必须由此改变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社会报偿（报酬，简单讲就是工资福利）存在差距的社会认知。

为高学历者创出工作岗位的同时，也需要给青年们深层的前途开发活动和职业探索过程提供帮助。大学生在前途选择上顾虑到适应性和兴趣，但选大学专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未来职业和自己的特征，在这时期，没有进行深层的工作开发活动，因此，对个人前途没有深度思考，就只想从事社会上认可的理想工作，所以必须通过深层的开发活动帮助青年们体系化的前途选择及发展，帮助他们树立基于现实的合理眼光。另外，据最近 OECD 的报告显示，全世界都重视扩大职业教育培训的现场实习及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必须扩大实施中等阶段、高等阶段及成人阶段的所有阶段的基于工作的学习，抓好质量管理，构建可以促进学校-职场顺利过渡的法律·制度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通过公共·民间职业稳定机构就业博览会等搞活就业，开发落后青年层的劳动市场进入途径是有必要的。

通过这些努力解决青年失业，可以防止出现青年们的经济·情绪问题，从社会角度来看，不仅可以有效防止社会·经济损失，也可以有效预防犯罪·贫困等社会问题。为此，政府和产业界，以及学界需要相互协作，为解决高学历青年失业问题做出积极努力。

韩国人的外貌至上主义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外貌至上主义文化

以外貌作为评价个人或集体价值的重要标准的社会就是外貌至上主义社会。追求美好的人类欲望和通过外貌想得到人们的关心和认可的欲望以及打扮的快乐是没有必要否认的。但是被统一化和规格化的外貌标准成为流行，贬低和排斥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身体外貌的社会文化具有歧视性。外貌歧视主义让脱离外貌规范的人产生不必要的自责心和自卑感和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之外，可以说是一种产生这种作用的社会歧视体制。与人类各自拥用不同长相的现实不同，通过特定的外貌差异把社会歧视正当化的话，外貌歧视主义与人种歧视主义、年龄歧视主义没什么差别。

但外貌歧视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是和以人种或年龄为标准的歧视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我们看身体的视觉变化。在人种歧视成为制度化时期，虽然身体被理解为和彻底由自然赋予的命运一样，但如今，身体是个人通过努力和投资的话就可以改善的对象，即，被认为是一种成就地位。因此，打扮得美好的身体可以正当享有补偿，不管理的身体应该甘受歧视，形成了这种社会风气。

二是以大众文化形态被包装的外貌歧视主义自然而然的侵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台了一些限制外貌歧视的法律措施之后，在正式领域为了避免法网以仍最小限度的方式维持着外貌歧视惯行，相反，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外貌歧视比以前更加露骨的显现出来。从韩国的大众歌谣、电视的减肥节目和外貌相关的新造词来看，例如，男性唱的爱情歌曲“美人赞歌”不分时代的成为潮流，但从20世纪90年

代后半期开始，在我们歌谣界出现了露骨地嘲笑不满足于男性视线的女性的歌曲。“我身边女人的脸长得都不好看”，“不能饶恕长得丑的”，“后面长得丑的女孩，把头转过去”等歌词与其说是歌词，更贴近于语言暴力。站在舞台上的肥胖人员展开减肥竞争的电视节目是在重塑外貌的烙印，女性参加者们被称为“胖子”，“怪物女”，“99 尺寸”，“60 英寸的腰”，“粗大的少女时代的腿”，节目字幕也是那样处理的。使脱离外貌规范的身体外貌沦落为别具一格的看点的媒体再现方式让观众产生了对外貌差异的害怕和不安。

在后期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吸引人们的各种身体管理产业也热衷于注重外貌。有关韩国美容整形产业的广告战略的研究表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以女性杂志为中心发起强大攻势的美容整形广告最多使用的战略就是“打下烙印”。外貌烙印为了突出美容整形手术的积极效果，在整容前会毫不例外的对身体进行消极描绘。外貌管理产业和大众媒体通过使特定的美的标准成为流行，从而发挥带动人们进行外貌管理的作用。在林仁淑对大众媒体的身体形象的接受程度和减肥欲望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的研究中，有减肥经历的女大学生中有 75.3% 的人说“看到有身材苗条的女生出现的音乐视频或照片时自己也想变得那样苗条。”认为“衣服只有身材苗条的模特穿才会更好看”的比率也达到了 72.9%。对青少年也造成影响的这种媒体环境可以说是蔓延我们社会的外貌歧视主义的再生产途径。

许多围绕身体的烙印性新造词构成了我们日常文化的一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高挑的身材和小脸型成为理想型外貌的条件，“短腿”或“长腿”，“大头”等外号成为令青少年感到最害羞的外号。最终，2009 年，受演出节目的影响，身高不到 180cm 的男性受到被称为“屌丝 looser”的侮辱，愤怒的男性们在网络上发起了“屌丝之难”。

虽然外貌歧视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但如今，男性也不再处于安全地带。根据2005年笔者深度访谈男大学生的研究表示，如今，他们也因为相对劣势的外貌，表现出遭遇不公的不安感。一部分人提到因为外貌而被很明显疏远的经历，但他们的外貌不安全地带局限于约会或会议等比较单纯的异性关系，原因是在结婚等被制度化的私人关系或就业市场等公共领域中，男性的成功条件并不是外貌，而被确认为能力。

21世纪20年代初期，出现了美女或猛男等新造词，随着身体部位渐渐人们理想的外貌条件，出现了更多的新造词(蜜大腿，黄金骨盆，巧克力腹肌，v型脸，蚂蚁腰等)。对人的身体划分名牌等级(名牌大腿，名牌腹肌)，并且贴上“山寨女”，“瑕疵女”，“B品女”的标签。“虽然长得不太好看，但心地善良”这句话已成为过去时，“长得不好看，脾气还坏”，“即使可以原谅有难言的过去的女人，也不能原谅长得丑的女人”，这些话几乎家喻户晓。甚至在公职选举游说场或大众演讲等正式场合，把长得丑的人拿来当做笑柄，这种事接连不断的发生。例如说“若选丑女候选人的话，需要花2年时间去整容，什么也做不了”，这样诋毁竞争候选人。另外，对婆婆来说，“漂亮的女教师是第一儿媳妇人选，长得丑的女教师是第2儿媳妇人选。”

不符合外貌标准的话，不仅是身体的“错误”，就那样放任身体不管的个人道德性问题也出现了，“善良的身体”，“善良的胸围”等流行词呈现了美好等同于得到优势的风气。由于懒惰、贪吃、没有自控力而招来的健康问题，这种针对体型肥胖者的指责大量出现。找到自己身体的缺陷并加以改造被说的好像是个人道德问题，这种社会氛围助长了人们不必要的自卑感和外貌管理。这样一来，随着身材和体重的社会意义从道德上变成了标准化，打造苗条身材的节目正成为社会上打造规范化身体的强有力的正常化体制。

青少年日常的外貌至上主义和精神健康

对我国青少年来说，外貌甚至成为了“被孤立”的标准。1998年，以男女初中·高中学生为对象的一个调查显示，作为被孤立的学生们的特性，最多被指责的就是他们的“长得不好看的外貌”(28%)。这种特性比起老师的偏爱(25%)，体质弱(21%)，以及下等水平的成绩(15%)，更多被视为孤立的条件。2000年后半期实施的一连串“青少年人权实况调查”也显示，有因为外貌或体格受到不正当歧视经历的青少年达到26.8%，因外貌歧视造成的日常生活歧视经历甚至让青少年产生自杀念头。尤其，女学生因不仅在外貌上，也在性别、年龄、学校成绩等所有领域要比男学生更多经历歧视，这更加令人担忧。

在身体被通用为自己替代品的时代，身体成为了影响心理安宁的主要因素。对自己身体的消极情绪会演变成对自己的消极情绪从而会损害自我尊重感，不依靠自己意志管理身体的话，甚至连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极速下降了。

在以我国青少年为对象的如下研究也表明了外貌会多方面的对他们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根据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实施的“2009年儿童·青少年肥胖实况和政策方案研究”(全国10156名小学初中高中男女学生为对象)显示，肥胖青少年们的自我尊重感和外貌满足度，以及对生活的满足度等低于正常体重范围内的学生，忧郁感也比正常体重范围内的学生更严重。

尤其，女学生尽管体重达到了医学上的正常体重也认为自己胖的倾向比男学生更多，低体重群的女学生们的外貌满足度比正常体重群学生更高(男学生在正常体重中最高)。在2008年首尔特别市调查中，(15~24岁的7672名青少年为对象)青少年的最大苦恼为学习(37.3%)和职业(22.1%)，紧接着就是外貌(12.9%)。对于外貌的苦恼比对于零花钱不

足或家庭环境以及健康的苦恼更多，比 2007 年增加了 8.7%。在“2010 年韩国青少年健康实况调查”中也显示外貌是仅次于学业压力和升学压力的严重压力源。因为身高、身材或长相饱受压力的青少年比率达 37.2%，尤其女学生比男学生的外貌压力更多(分别为 48.3%，26.8%)，两名高中生中就有一名高中生遭受过外貌压力。据报道，我国 35%的拒食症患者为 10 多岁的青少年，其中 30%却是小学生。根据 2009 年食品安全厅调查显示(全国城市初中高中生 7000 名)，女学生中约有 14%属于进食障碍高危群。外貌压力、对看起来不苗条的身材的担忧、对肥胖的恐惧、对不满意的身体的责备和厌恶、过度的食欲控制、减肥上瘾和整容上瘾等，女性比男性有更多。

但是，很多研究显示我国的青少年和自己身体建立关系的方式要比其他国家的青少年更加带有消极性。韩国青少年不论男女比美国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满足度更低，尤其韩国女学生一定要减肥的强迫性观念和进食障碍问题比美国女学生更多。与中国、日本、美国的高中生的其他比较研究显示，韩国学生对整容或减肥等外貌管理的关注更高(韩国 83%，中国 68%，日本 65%，美国 32%)。通过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了解到韩国学生较高的外在价值倾向，很难以他们的本质特性去断定其差异，反而，在我们社会成为日常化的外貌注重文化中，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加注重外貌，对外貌改造方法也持有极大的关注。在分析外貌歧视经历和整容以及减肥的关联性的研究表示，因为外貌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或被当做“和男朋友交往时的不利因素”，越是有这些经历的女生更加有整容或减肥经历。研究表示因为外貌，在异性交往中有不利经历的女性的减肥概率比没有这些经历的女性高出大约 1.9 倍。据 2007 年韩国女性民友会的调查显示，10~20 岁的女性切实体会到外貌重要性的最多契机是“因为外貌获益或遭受不利益时(40.4%)”，其次是“看到因外貌而成功的艺人时(23.7%)”，最后是“看到因外貌出众在学校备受欢迎的朋

友时(16.6%)。如此一来，外貌条件可以转变为社会成功、财富和名誉及人气等社会地位，这使得经历过或目睹过这些情况的女性埋头于打造更有竞争力的身体战略。

需要努力克服外貌差别主义

在无限的激烈竞争时代，个人被要求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提高竞争力的工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社会成功所需的肉体资本。受日益增加的外貌规范的影响，我们更难满意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不断地钻进打造新身体的电视节目中。另外，以外貌为标准权衡人的价值的世态与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成熟社会背道而驰。并且，在韩国社会中，若不积极改善当今的外貌至上主义的话，以后将带来由和人种歧视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危机。例如说，移居劳动者、国际结婚移居者，这些多文化家庭出生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和典型的韩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和长相，在日常生活中仅凭这个理由可能会对它们肆意进行更残酷的外貌歧视。

个人感知自己身体的方式和观察评价他人身体的方式受到其身体存在的社会文化性的影响，进一步说，我们看我们自己身体的方式再次给精神健康造成影响。那么，在外貌烙印成为日常化的我们社会，对于很多脱离狭隘的外貌标准的人来说，很有可能侵害他们的精神健康。据许多经历研究报道，个人的自我尊重感比客观的身体状态更加受到主观的外貌满足度的影响，被烙下外貌规范脱离者烙印的人容易患上忧郁症，导致自尊感下降。因此，在增进国民健康层面上，也要为克服对助长外貌烙印的大众文化等外貌歧视主义需要做出政策努力。